

新地缘政治结构理论探索

——解释模式视角

陆俊元

(江南社会学院 教务处, 江苏 苏州 215124)

[摘要] 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主义模式、空间—权力关系模式到结构主义模式的演变。以结构主义模式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理论较好地发挥了对世界政治的解释功能,但对动态的国际关系的解释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建设可以在继续完善以地理区域为单元的传统结构理论的同时,积极思考和探索以行为体为主体的新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实现结构主义模式中具体解释方法的创新,以加强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解释能力。

[关键词] 地缘政治理论; 解释模式; 方法论创新; 结构主义; 行为体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8)05-0009-06

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地缘政治学在对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解释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考察现代地缘政治学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地缘政治理论在思维范式和框架上存在明显差别,从方法论层面看,实际上反映的是理论家们构建和运用的地缘政治学解释模式的差异。解释模式是指贯穿于解释方法之中的基本思维范式与分析框架,实质上体现的是各种解释方法之间的内在关系。

解释模式关系到地缘政治学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就解释能力而言,任何解释模式支配下的理论都有时代所致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特征发生了重大改变,迫使我们在当今的地缘政治理论建设中认真思考和探索对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现实具有足够解释能力的地缘政治学解释模式,并致力于解释方法的发展与创新。

自19世纪末现代地缘政治学诞生以来,其理论

解释模式的变化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从自然主义模式、空间—权力关系模式到结构主义模式的演化。^{[1] (P.107-109)}

一、自然主义模式

早期的地缘政治学在解释模式上可归纳为自然主义模式,其中以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契伦(Rudolf Kjellén)的理论为代表。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通过构建“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等核心概念,从国家层面探索地理与政治的关系,创建了地缘政治学。他利用生物学知识和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运用与生物类比的方法研究国家的政治问题,把国家比作具有生命的有机体,认为国家像生物一样,是一种生物有机组织形式,其社会行为遵循生物规律,在国家存在的过程中,具有生长、斗争、演变和衰亡的演变过程。同时,他认为国家有机体

的生存和运行依赖于它所在的环境,如同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国家作为健全的空间有机体通过扩张领土而增强力量是必然的。拉采尔把自然环境条件与国家政治融合起来,开创了独特的研究方法,成为地缘政治学鼻祖。瑞典籍学者契伦进一步发挥拉采尔的理论,用地理环境来解释政治现象,其解释模式与拉采尔是一致的。其后以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按照自然主义模式构建的。如豪斯浩弗等人十分推崇“国家有机体”学说,强调生存空间是国家最基本的需要,国家有机体的生长和发展依赖于生存空间的获取,足够的生存空间给予国家更大的动力,获取更多生存空间是合理的。他们使新的自然进化论的权威满足旧德国政治哲学的需要,使之成为德国恢复为世界强国地位的喻世箴言。^{[2] (P.280)}

在近代科学诞生时期,由于哲学反思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上,同时受自然科学解释模式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盲目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和传统,用自然实体、自然因素和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和人的活动,自然主义成了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流。^{[3] (P.56-62)}自然主义模式下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显著特征是:模仿或借用自然科学成果,试图用自然规律解释社会规律,并把自然条件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拉采尔认为,人类所以能成功,在世界上生长和存在,是因为人类也像生物分布所产生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一样,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他把政治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契伦把国家看成是一种人格化的具有感觉和理性的生物,他用国家五器官构成理论——政府构成、人口构成、社会构成、经济构成和地理环境构成——来阐述所谓的“政治法则”。这些理论把地理环境特别是国家的领土及区位特征看作是影响国家政治的关键要素,强调地理要素对国家发展的限制作用,夸大甚至绝对化地理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契伦把国家的空间视为国家成功的关键,豪斯浩弗则坚信国家的位置和领土特性是决定其命运的主要条件。德国地缘政治家们的信念是:

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是依靠了地理条件。^{[2] (P.290)}拉采尔、契伦以及豪斯浩弗等人机械地用生物进化的规律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把生物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硬套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按自然主义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试图把复杂的人类社会简单地比作生物群体,用自然规律解释和推导人类社会的规律,其解释模式存在明显弊端,必然不可能真正揭示人类社会的活动规律。自然主义模式的根本错误在于完全忽视社会建制以及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有与自然事物和过程根本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尽管它们曾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精神生活中某些自然因素的作用,但所得出的结论很多是牵强的、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3] (P.56-62)}

二、空间—权力关系模式

第二类地缘政治理论在解释模式上可概括为空间—权力关系模式,以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等为代表,他们抓住地理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构建其理论主张,强调某些空间对权力具有决定性作用,甚至是全球性的决定作用。马汉以“制海权”概念解释历史,其海权理论的中心论点是: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如果能够控制公海,就能控制世界的贸易和财富,从而控制全世界。一个国家获得这种地位的能力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陆地形态、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和政府特征六方面条件。富有进取心的国家必须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依靠海洋去获取海外的原料、市场和基地,而海洋是自然赐予的便捷通道。所以,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具有在海洋上自由行动的能力,必要时能够垄断海上贸易,为此须建设一支在国内外拥有作战基地,并有庞大商船队辅助保障的海洋力量。麦金德以“枢纽地带”和“心脏地带”等概念阐述其陆权理论,他将世界历史置于广阔的地理空间中考

察,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去思考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开创了分析世界形势的全球战略观念。他认为,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是世界政治运行的“枢纽地带”,是控制整个世界的“心脏地带”。斯皮克曼沿用了麦金德的分析框架,并有所超越地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强调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对建立世界霸权的特殊意义。值得指出的是,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理论除了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外,同时也兼有空间—权力关系模式的部分特征。

空间—权力关系解释模式的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空间与权力的关系特别是空间决定权力的思想为理论核心,崇尚控制地理空间对赢得世界霸权的价值,强调控制空间对获取权力的决定性意义。马汉、麦金德等研究的空间并不是政治行为体版图所覆盖的区域,而是忽略了国家边界的、以世界全部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地域空间,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空间中影响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部分。马汉推崇海洋的机动性和便利性,强调海洋力量、制海权是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麦金德强调欧亚大陆核心地区对控制整个欧亚大陆并进而支配世界霸权的作用,认为它是世界政治的枢纽;而斯皮克曼认为,欧亚大陆核心地区之外的、与海洋交接的边缘地带是控制世界的要害。

空间—权力关系模式的地缘政治研究抛弃了早期地缘政治研究中简单借用自然科学理论的思路,超越了自然主义,采用侧重于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紧紧抓住地理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和国际关系,把地缘政治学发展为被广泛用于解释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

然而,传统空间—权力关系模式下的地缘政治理论突出显现了空间决定权力的单一思维,在方法上,它无视业已存在的以行为体为单元的世界政治体系,完全根据地理空间的性质和地理位置的差异,将地理空间设定为决定世界政治的至高因素,在理论上容易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沼,实践中往往沦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三、结构主义模式

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了以结构主义模式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理论,它们以地理学的区域观念为指导,用地域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整体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结构以及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代表人物有科恩(Saul B. Cohe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

科恩用区域的方法研究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他认为,世界是分裂的、多中心的和按等级排列的。他把世界分成世界性区域和地区性区域两大层次,前者称为地缘战略区,后者称为地缘政治区。科恩自1964年首度发表其结构理论后,多次修改和调整其模型中的局部结构,但基本结构保持一致。2003年科恩继续完善他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提出了等级制排列的空间结构:第一层,宏观层面的地缘战略区;第二层,中观层面的地缘政治区;第三层,微观层面的民族国家。此外,还有“破碎带”、“压力带”、“通道”等。^{[4](P.33)}科恩对世界地缘政治现实的观察及其建构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他在继承以整体的眼光观察世界的地缘政治学传统优势外,以地理学的区域方法为基础,构建了地缘政治学的结构理论。

1980年代开始,沃勒斯坦根据世界体系分析理论提出“中心—外围”学说,设想出一种与冷战格局截然不同的全球结构,成为重要的理论突破。他不是从分裂的视角而是全球一体的视角,把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即体系来考察世界地缘政治关系。沃勒斯坦并没有把南北关系看成是分裂的关系,而是形成中心—外围结构。沃勒斯坦重视全球形势的经济基础,用南北对抗代替东西对抗,并将它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心—外围学说比两极和多极世界观更适于描述和解释“新的世界秩序”。^{[5](P.191)}

冷战结束后,亨廷顿以世界文明为主题,运用结构分析方法,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其中心内容是:文化是塑造全球政治的主要因素,文明冲突将控制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

的战线。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以政治和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国家集体已无多大意义,正确做法是应以文化和文明为标准进行划分;当前世界的文明有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世界形势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定的,未来最重大的冲突将会在各大文明的断层线处爆发。从方法上看,亨廷顿采用的是结构思想,只不过选择了以文明因素作为观察的指标。

科恩在全球地缘政治系统中描绘出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等级制排列的政治地域结构。沃勒斯坦根据世界经济关系,按照不同地区对财富的占有状况,在世界体系中描绘出一个“中心—外围”结构。亨廷顿根据世界主要文明的性质及其差异,建构出由不同文明拼接而成的板块结构。虽然这些学者的具体研究目标各不相同,但他们所建立的结构理论具有相似的基本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客观地描述世界地缘政治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分析结构内的互动关系更好地解释世界地缘政治关系。这些理论牢固地确立世界一体的观念,以全球性的整体视野观察全世界的和全人类的地缘政治关系。在方法上,它们超越了以往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包含着建立在地理学区域观念基础之上的地域结构分析框架,解释能力得到增强。

以科恩等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理论创立了以结构主义为特征的解釋模式,超越了以麦金德等为代表的以空间—权力关系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理论。从方法论角度看,这些理论中蕴含的结构思想主要来自于地理学,即以强调地域差异的地理学观念为指导,去发现或设置把一个地理区域整体分割为不同性质的地缘政治单元的分界线,从而勾勒出表达地缘政治结构的世界地图。这种方法在本质上是传统的地理学方法,分割出的地缘政治单元既没有以政治行为体为基础,也不考虑行为体的完整性,其结果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地理结构。以传统地理学方法为背景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长于对世界政治进行静态的描述,但难以把握由行为体塑造的世界政治的动态过程,不便对行为体之间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进行及

时的解释,其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在传统地理学方法基础上的结构理论主要是以政治要素的地域差异为指标的,但却忽视了行为体在塑造地缘政治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因而在面对激烈变动的国际关系时,其解释能力受到约束。因此,探索以行为体为主体的新地缘政治结构理论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的必然需求。

四、以行为体为主体的 新结构理论探索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社会科学应当以解释社会系统行为为重点。^{[6] (P.2)}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要求是,不仅需要国际关系现实做出描述,而且更需要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过程做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强调,政治首先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研究政治的动态的过程,把政治放在社会、历史和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来加以分析。^{[7] (P.11)}因此,作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地缘政治理论,肩负着更多的解释责任,需要对地缘政治过程做出有效解释,只有这样的地缘政治理论才能符合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需要。

要做到这一点,在根本上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地缘政治的本质。地缘政治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8] (P.86)}它既是一种具有相对静态特征的现实关系,又是一个行为体之间基于地理环境进行的充满活力的动态过程。地缘政治的主体是具有空间属性的政治行为体自身,行为体在塑造地缘政治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考察地缘政治关系及其过程,不应该忽略对政治行为体的关注。在使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考察地缘政治时,应努力构建一种具有内部互动并能够与世界政治同步运行的结构,这种结构必然以行为体为主体。因此,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建设还存在另一个方向的选择,那就是以政治行为体为主体的结构理论。

地缘政治结构是由政治行为体特别是作为力量中心的行为体主角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它由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连接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等硬件要素和软件要素组成,新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建设应首先探究结构内的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行为体 (actors)、行为体之间的地缘链接 (geo. linkage)、行为体之间的互动 (interaction)是一般意义上构成地缘政治结构的基本要素,三者缺一不可。结构中,以大国或国家集团为代表的行为体主角(或称力量中心)是构成地缘政治结构的支柱,行为体之间的地理空间连接是形成结构的网络条件,而行为体之间通过网络产生的互动是赋予地缘政治结构生命的动力。

在把握地缘政治结构一般构成的前提下,继而根据参与结构塑造的主角行为体的数量,来探索地缘政治结构的不同模式,因为结构中包含的行为体单元的数量多寡不仅决定了结构的复杂程度,而且决定结构的形态:单一结构、二元结构、多元结构等。这里以由三个以上主角行为体建构的多元结构为例,考察多极地缘政治结构及其互动模式。

多极结构是由多个行为体主角共同支配的复杂结构,含有多种力量组合和多组互动关系,各行为体在复杂的相互牵制中互动。例如,四个主角行为体构成的结构中包含有6对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五个主角行为体建构的格局则包含10对双边互动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由 $n(n \geq 3)$ 个主角行为体组成的多极结构中,共包含有 $n(n-1)/2$ 组双边的相互作用关系。复杂的结构和互动关系降低了某一主角行为体单独控制结构运行的可能性,使它想要改变结构或摆脱结构束缚的企图因容易受到其他多方行为体的抵制而难以实现。

多极结构中,不同位置上的行为体地位不同,角色存在差异。一般而言,中心国受力面广,互动关系复杂,而边缘国相对自由。居于结构中央部位的行为体地位特殊,处在多股力量相互作用的交汇处,是地缘政治力量的重要传承者,其活动自由比其他行为体要受到更多限制,同时,它比其他行为体获得更多的参与互动的机会。位于结构边缘的行为体享有

较自由的地位,其受力结构相对简单,主要面对一个方向的地缘政治作用力作出反应。如在19世纪初欧洲形成的多极格局中,英国独处西北一隅,在维也纳体系中,英国所受到的限制比其他欧洲大陆国显著减弱,而大陆国之间矛盾重重、相互牵制,使英国有机会充分利用大陆国之间的矛盾,在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中扮演自由者角色。

多极地缘政治结构包含多个三角关系,其中主三角对结构稳定作用突出。一个复杂的多极结构实际上由若干个三角关系组成,它们地位不等,活跃程度不同,有主次之分。那些最强大的地缘政治行为体构成的主三角往往是多极结构的重要支配者,对结构稳定的影响最突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地缘政治结构中,由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构成的地缘政治三角关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三角互动关系是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重要一面。

在主角行为体之间形成的地缘政治轴线,在较大程度上引导结构内的互动关系。多极结构中的多个双边关系是严重不平衡的,在两个最强大的力量中心之间的连线通常代表结构的地缘政治轴心,它是结构内互动关系的中轴,往往主导整个格局内的互动关系。从近现代欧洲国际关系格局来看,法国、俄罗斯、德国是欧洲大陆的突出强国,法俄关系、法德(普)关系、俄德(普)关系长期成为欧洲的主要国际关系,法、德、俄之间形成横贯欧洲东西的地缘政治轴心,主导欧洲格局内的国际关系互动。

依此方法,我们还可以建立并讨论其他形态地缘政治结构的模型及其互动模式,并将其运用到对国际关系的动态解释中。^{[8] (P 246-292)}

地缘政治结构是由政治行为体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相互作用所形成,因此,在以结构主义模式审视地缘政治关系时,一旦空间被确定,就可以将注意力从地理空间转向政治行为体,考察以空间为基础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按照上述思路与方法构建的以行为体为主体的新地缘政治结构理论能够同现有结构理论相得益彰,为解释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或补充。

五、小结

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解释地缘政治关系和过程。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进程经历了从自然主义模式经空间—权力关系模式到结构主义模式的演变,解释模式存在较大差异。20世纪60年代后,地缘政治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特征的解释模式,用结构分析方法解释世界系统中的地缘政治关系,并力图对地缘政治关系的运动和变化做出解释。较之其前的地缘政治理论,结构主义模式表现出更好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理论发展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然而,现有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是以传统地理学的区域方法构建的,它主要适用于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内描述和解释世界政治现实关系,而对动态的国际关系互动过程的解释能力相对不足。

当今的地缘政治理论发展总体上处在结构主义模式支配下的阶段,但在结构主义范式中、在具体解释方法上,存在着以地理区域为单元的结构理论和以行为体为单元的新结构理论的多个(不同)发展方向,前者长于对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进行静态研究,后者有利于对运动的地缘政治过程进行动态分析,两者并无冲突,相反可以相互补充。

事实上,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地缘政治理论建设是随着因地缘政治现实变化引发的解释需求变化而发展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导致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激剧变动呼唤人们去构建一种对政治过程具有动态解释能力的结构理论,因此,笔者主张,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建设可以在继续完善以地理区域为单元的传统结构理论的同时,积极思考和探索以行为体为主体的新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实现结构主义模式中具体解释方法的创新,以加强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解释能力。

[参考文献]

- [1] 陆俊元. 从自然主义到结构主义: 地缘政治学方法论[J]. 人文地理, 2007(5).
- [2] 王思涌. 政治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3] 李建珊.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解释模式的差异[J]. 南开学报, 1995(3).
- [4]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 [5] [英] 杰弗里·帕克. 地缘政治学: 过去、现在和未来 [M]. 刘从德.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 [6] [美] 詹姆斯·S·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M]. 孙晓彤.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 [7] 王沪宁. 政治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8] 陆俊元. 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J].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齐琳)